

TSIE

大学的功用

Clark Kerr / 著

陈学飞 / 陈恢钦 / 周京 / 刘新芝 / 译



The Uses of the

iversity

当代世界教育名著译丛

G571.2/6

● 当代世界教育名著译丛



北体师 B0004212

大学的功用

Clark Kerr / 著

陈学飞 / 陈恢钦 / 译

周京 / 刘新芝 / 译

赵宝恒 / 校



江西教育出版社

世纪末的思考

——为《当代世界教育名著译丛》作序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似乎这个世纪即将结束，新的世纪即将到来。人们都在纷纷思考：本世纪我们怎样走过来的，有些什么经验教训？新的世纪将以什么面貌出现在人们的眼前，我们将为它作些什么准备？政治家在思考，经济学家在思考，社会学家在思考，教育家尤其在思考。因为人是社会发展的第一要素，人的发展将影响到世界发展的未来；而人的发展又不是几天、几个月或一年半载就能完成的。教育的周期很长，以一般的普及义务教育来讲，需要九年左右；以培养一名专门技术人才来讲，需要12~16年的时间。教育要为新的世纪准备人才，从现在就要着手。教育家们的迫切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教育是离不开社会发展的，人的发展必须和社会发展相一致。只有这样协调地发展，社会才能进步，而培养人的教育事业也才能得到发展。为了给二十一世纪培养人才，就必须对二十一世纪的社会进行某种预测。所谓预测，并不是无根据的猜想和臆测，而是要在总结本世纪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的推理，得到比较科学的，符合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某些假设。按照这些假设来发展教育，并随着事态的发展不断验证，不断进行调整，才能培养出适应二十一世纪社会发展的人才。因此，总结本世纪的经验，将是世纪末思考的重要内容，把本世纪走过来的道路想清楚了，未来的道路也就容易找到。

世纪末的思考

翻译当代教育名著的意图也就在于此。就是想回顾一下二十世纪后半叶教育发展的历程，找一找二十一世纪教育发展的轨迹。

本世纪后半叶的教育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世界各国教育大发展大改革的时期。它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契机，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经济的发展要求教育为它培养众多的人才。“人力资源的开发”被作为高速度发展经济的条件在六十年代第一次提了出来。于是中等教育很快得到普及，高等教育也有了空前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国际竞争的激烈，要求教育进行彻底的改革。首先是教育内容的改革，改变教育内容只反映上个世纪科学成就的陈旧落后的状况，增加现代科学技术的新内容；其次是教育条件的改善，实验设备的更新，现代化教育技术在教学过程中的应用，为提高教育质量提供了物质基础。这一切都是在新的教育观念下展开的，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是教育思想最活跃的年代。“人力资源开发”理论的出现，逐步形成了一门新兴的教育分支学科，这就是教育经济学。这个时期教育社会学、教育心理学等老的学科也有了新的发展。传统的以传授知识为主的教育思想受到了冲击，代之以发展学生的能力为主的教育思想；传统的学校教育为终身教育所替代，特别是随着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的发展，各种类型的学校如开放大学、电视大学、函授大学等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教育不再是儿童青少年的特权，而是全体公民的不可或缺的活动。教育不论是从时间上、空间上还是内容上都大大扩大了。

从这个时期的情况可以看到，教育的发展和改革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客观的要求，同时又反过来极大地促进了政治经济的发展。

大学的功用

第二个时期是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期世界教育停滞和危机的时期。1973年开始的由石油危机而引起的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持续了十年之久。经济危机给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发展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主要表现在：毕业生就业困难，大学毕业生过剩，失业人口增多；教育质量下降，学生的厌学情绪增长，青少年犯罪率增加。人们表现出对教育发展的失望情绪。在五十年代感到人才缺乏，人们以为只要学习，不仅能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好处，而且为个人的地位、生活都会带来好处，但到七十年代却一变而为人才过剩，这种失望情绪影响到对教育投资，从而影响到教育的发展。

第三个时期是八十年代中期到现在。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教育的停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人们在寻找新的出路，教育改革又成为八十年代的重要话题。在这个时期，各个国家关于教育改革的方案纷纷出笼，可以说使人目不暇接。1983年美国全国教育质量委员会的公开信《国家处境危急，迫切需要教育改革》，打响了新的教育改革的第一声春雷，紧接着各种改革实验在美国兴起。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于1984年成立了临时教育咨询委员会，拉开了日本第三次教育改革的帷幕，接着是连续四次咨询报告，为日本的教育改革出谋划策。苏联在酝酿了多年以后于1984年抛出了《普通学校和职业技术学校改革的基本方针》；1986年又公布了《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改革的基本方针》；以后又随着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新思维”在教育理论界开展了合作教育学的大论战，并且在1988年再度提出新的改革方案。凡此种种都说明，教育改革已经成为社会的热门话题。

八十年代的改革与六十年代改革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六十年代改革的中心是促使教育的现代化，八十年代的改革则集中在提高质量这个重心上。这是由于教育经过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大发展，出现了数量与质量的矛盾，特别是高等教育由原来是选拔

世纪末的思考

性的尖子教育一变而为选拔性极小的大众教育。进入高等学校的门槛大大降低了，这不仅影响到高等教育的质量，也同时影响到中等教育的质量。可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却要求有较高质量的人才。国际竞争的日益激烈，越来越表现在科学技术的竞争上，人才的竞争上。哪个国家能够培养掌握高科技的人才，哪个国家的工人的素质较高，哪个国家就能立于不败之地。因此教育改革不仅为教育家所关心，而且为各国的领导阶层所瞩目。

八十年代的教育改革正在延续到九十年代，大家都把目标瞄准在二十一世纪上，要为二十一世纪培养人才。

二十一世纪将是个什么世纪？未来学家有各种预测。我不是未来学家，并且由于我的知识所限，只能说出几点与教育有关的特征：

(1) 科学技术将更加迅猛的发展，它将带来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生产技术和工艺的不断革新，从而造成劳动的变换、职业的更新。职前教育已经不能适应这种劳动变换的要求，必须把职前教育和职后教育结合起来。而这种结合又将以职前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为基础，如果职前教育没有打好坚实的基础，职后的继续教育也将无法进行。

(2) 地球上的资源将进一步涸竭，生态遭到破坏，环境污染将进一步严重，人类的生存圈受到进一步威胁，人类一方面要节约资源，另一方面要开辟新的资源，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将由此而产生，同时还要防止环境进一步恶化。它要求教育为开发新资源，为保护人类的生存圈培养掌握高科技的人才。

(3) 世界总的局势将进一步缓和，但是经济领域内的竞争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将越来越激烈。这种竞争和斗争的激化威胁着世界和平，难免有一天会发生局部的和地区的战争。谁能培养出对自己的事业有坚定信念并为之而斗争的竞争意识和能力的人才，谁就能在竞争和斗争中取胜。

大学的功用

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们，在这些问题上的眼光比我们尖锐。美国卡内基教育和经济论坛在1986年5月发表的“教育作为一种专门职业”的工作组报告中开头第一句话就说：“美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正在减弱。我们竞争对手生产力的增长超过了我们。”接着说：“很少人觉察到世界经济正处在一场深刻的转折关头，这一转折要求对教育标准做出新的理解，即必须造就一支能够参与全球竞争中竞争一比高低的高薪劳动队伍。”英国在高等教育的绿皮书中也提到：“我们国家的竞争对手，正在培养或计划培养比英国更多的合格科学家、工程师、工艺和技术人才，繁荣经济需要这些专门人才方能发挥企业家的才智和支持他们的成就。”其他国家也无不为了竞争而致力于教育的改革。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讲，还有一个如何抵制资本主义的渗透，进行反“和平演变”的斗争问题。事实越来越明显，不仅帝国主义者企图把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青年人的身上，就是一些西方知识分子，由于他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与我们不同，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发展总是不能理解，总想用他们的意识形态来影响我们的青年人，因此，社会主义要想在未来的世纪中取得胜利，就要培养有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的，掌握高科技的人才。

总之，新的世纪将给教育提出一系列的要求，教育工作者只有站在时代的前列，了解世界发展的趋势，才能使教育适应时代的要求。

前面讲到，二十世纪的后半叶是教育空前发展的时代，在这个时期里教育理论也有丰硕的成果。教育工作者要想站在时代的前列就必须了解和研究这些成果。“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使我们失去了宝贵的时间，改革开放的十年打开了我们的眼界，我们接触到许多新的教育思想和理论，使我们目不暇接。但是由于语言文字的局限，我们接受到信息有很大的局限性。介绍过来的理论未必是有代表性的，更未必是站在学科的前沿的。为此，北京师范大学

世纪末的思考

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所和江西教育出版社计划出一批《当代教育名著译丛》，想较为有选择地介绍一批国外有代表性，有影响的教育理论，供我国读者参考和研究。参加编委会的除了北师大外教所的几位同志外，还有北大高教所的汪永铨教授，原国家教委高教二司司长，北师大教育管理学院兼职教授刘一凡同志等。编委会开会的时候，为教育名著几个字上深费斟酌。什么叫名著，似乎应该是经过历史考验，为大多数教育家所公认的著作。但是如果这样来下定义，则当代就不可能有名著。因此我们认为的名著，主要是指该著作在学术上是站在学科的前沿，自成一种流派或者有独特的见解，并且有一定的影响的著作。所谓当代，是指本世纪后半叶以来，特别是七十、八十年代中出版的著作。我们想，如果从不同的教育分支学科中选择二、三部有代表性的著作介绍给读者，对于我们把握当代教育理论发展的动向和趋势是会有所帮助的。无用说明，教育是有阶级性的，教育理论属于意识形态的部分，也是有阶级性的。但教育的某些规律具有普遍意义，因此读者在阅读这些著作的时候要注意透过意识形态的层面来把握教育发展的普遍规律。也就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分析批判地学习，象马克思阅读黑格尔的著作那样，能够从中吸取它的合理的内核。为了帮助广大读者学习，我们也将组织一些同志来写文章，介绍这些著作。

当代教育著作甚丰，我们选择的几部也只能是挂一漏万，希望读者提出意见，在第一期工程结束以后还可以继续接下去，使这套丛书能够不断地给教育工作者提供新的信息。

顾明远

识于国庆四十一周年纪念日

译者前言

《大学的功用》(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 是美国当代著名教育家克拉克·克尔 (Clark Kerr) 1963年4月在哈佛大学戈德金 (Godkin) 讲座上的演说, 于同年出版, 1972年和1982年又两次再版。

克拉克·克尔 1911年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他曾先后就读于斯沃思莫尔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加州伯克利大学。1952年被推选为加州伯克利大学校长, 1958年又出任加州大学总校校长, 直到1966年。而后, 他先是出任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主席, 继而担任卡内基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理事会主席, 直至1980年退休。

克拉克·克尔在一生的奋斗中, 为美国当代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曾先后获得37个荣誉学位; 他的著作被译成11种文字; 他被美国教育界称作是当代美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设计师。《大学的功用》比较系统集中地阐述了克尔关于美国现代大学的思想, 是我们了解和研究美国高等教育的一部经典性著作。至于本书的观点, 我们并不尽赞同, 还有个别观点, 甚至明显是错误的。

本书系根据1982年第三版翻译, 各部分的译者是: 第一部分, 陈恢钦; 第二部分, 1982年前言和1963年前言, 陈学飞; 第三部分, 周京; 1982年后记和1972年后记, 刘新芝。余崇健和陈学飞作了初步校核, 赵宝恒最后对全书作了审校。

由于水平所限, 译文不妥之处必定不少, 望各位同行, 各位读者批评、指教。

译者

1989年12月30日

1982年前言

“1972年后记”叙述的是“自己过后对1963年讲稿的内容应该如何来写的想法。”针对《大学的功用》所写的毫无特色的文章——当时为数不多，到那时业已大量问世；在这些文章中，有的是因粗心而产生的误解，有的则出于蓄意曲解。因此，我需要根据自己的了解澄清事实，并着实地进行一些痛苦的反思。

写“1982年后记”的意图则全然不同。在1972年，我提出了如下的迫切问题：“现时美国的大学模式是否正在逐渐衰亡”，“从1870至1970这一百年是否将成为美国大学兴起与开始衰退的时代”或“美国大学是否经过一段时间的困境后，将重新壮大并上升到空前显著的地位”。我只把这些问题摆了出来，未作解答。

接着，充斥着遗憾与失望情调的应答文章不断的发表——大多数认为高等教育，尤其是大学，注定走向衰落。1973年秋，我在美国教育委员会的年会上作了关于“高等教育界的忧郁心情”⁽¹⁾的报告。我注意到了近来出版的标着如下书名的一些图书，这些书籍在我的书架上非常显眼。

《无政府状态的高等教育界》(1970)

《退却中的大学师生》(1971)

《混乱中的专科院校》(1971)

《处于危机的美国大学》(1968)

《高等学府内的混乱状况》(1970)

《返回中世纪》(1969)

《高教政策的破产》(1972)

大学的功用

- 《彻底垮台》(1971)
- 《高速公路上的盲人》(1971)
- 《我们学院的混乱状态》(1963)
- 《对抗与反击》(1971)
- 《美国大学的灭亡》(1973)
- 《一位大学校长的毁灭》(1972)
- 《有关高等教育的教条之解体》(1971)
- 《垮掉的高等教育界》(1972)
- 《不断遭受干扰的大学》(1970)
- 《激增的大学》(1971)
- 《美国大学的衰落》(1972)

以上书名仅是举出的一些实例，这个书名单还可按字母顺序接着列下去。我曾说过“这就是某些高教界之精萃，即得以著书立说者，对我们事业的看法”。智力上如此训练有素的人们，当其利益似乎受到威胁时，也会如是地反复无常——他们敏于对当前事件作出反应，对于历史实情则不太顾及，这在我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那么，这些观点正确吗？我的回答是：“对只看到黑暗与衰亡的人，我们必须说很多好的事物正在出现。对宣称一切都是失败的人，我们必须说事实上很多工作正取得成功。对只看到问题成堆的人，我们必须说肯定有缓解问题的机会。”这是当时我作为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主席所说的话。该委员会对美国高等教育进行了长达十二年的调查，并提出有关建议。后来，仍由我担任主席的卡内基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理事会于其1980年的最后报告中总结道，实际上，回顾起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对于高等教育来说是顺利的十年。”⁽²⁾

回忆中的历史实际情况与现实中大学教师对高教的令人忧虑的看法之间的差距大到如此地步，实属罕见。

1982年前言

关于美国的大学，我们从开始时令人如此失望，但结束时被认为是“顺利的十年”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与骚乱的六十年代学到了什么？确实，我们学会了谨慎地对待我们的很多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学者处于困境时所发表的过分渲染的言辞与片面的见解。在这些学者中间，犹如高速公路上的盲人太多了；他们不知道川流不息的车辆正朝着哪一方向行驶。我们还学到了什么呢？在麻烦不断的时期，除了新的麻烦以外，我们对美国大学可能的期望是什么？这些就是“1982年后记”中扼要说明的问题。

克拉克·克尔

荣誉校长

加利福尼亚大学

加利福尼亚，伯克利

1982年3月

注：

(1) John F. Hughes, ed., *American Education and the State* 《美国教育与国家》
(Washington, D.C.: 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1975).

(2) *Three Thousand Futures* 《三千所高校的未来》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80), P. 13.

1963年前言

在美国，大学正处于一个历史转折点：美国大学在沿袭过去的同时，正朝着另一方向转变。基于1963年4月23、24与25日在哈佛大学举行的戈德金讲座内容的这本书想要描述与评价美国高等教育某些新的重大发展。从本书未用经常会使我们担心的“对大学的滥用”作为题目来看，可知《大学的功用》这个书名暗示一种通常的乐观情绪。还有值得特别提到的是不应将下面论述中的分析误作赞同，或把描述误解为辩护。

尽管大学是我们最古老的社会机构之一，如今它却发觉自己处于一种全新的地位。大学，在处于除了陈规旧习以外没有任何事物可能阻碍改革的情况下，面临着无先例可援的新任务。它不应抱残守阙、留恋过去，而是需要严肃地正视其所处的现实世界。

就大学来说，目前的基本现实是人们普遍承认新知识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此刻，我们意识到大学的无形产品——知识可能是我们文化中影响各个专业、甚至社会各阶级、各地区，以至于各个国家之兴衰的最强有力的因素。

由于这样的基本现实，人们正在要求大学为城市、地区与国家的种种目的前所未有地创造知识，以及除了象人们所理解的那样大多数知识最终会服务于人类以外，完全没有目的地开发知识。人们还要求大学向民众普及知识，使空前的人口接受教育。

这种现实正在改变大学本身的性质与功能。有关师生关系、科研以及教学与行政管理作用的旧观念正在以无可比拟的速度变化着。这发生在看来是整个一代人正在叩击高校的大门、要求入

1963年前言

学的年代。对于本质上保守的学者们，新一代的这种叩击声往往类似暴民的呼嚎；对于政治家，它是需要顺从的声音；对于行政管理者，它是一种前兆，预示出我们正处在新的时代，我们现在作出的种种决策将产生异乎寻常的效果——既有好的，亦有坏的。

因此，对于我们所有的人，对于从未见过常春藤覆盖的学府大楼的人与经历过学府大楼生活的人同样，大学已开始处于一种新的中心位置。

很奇怪，直到最近大学才是刚刚被人研究的机构。西摩·哈里斯（Seymour Harris）是同我一起工作的经济学家中首批把教育和任何其它社会活动一样地予以研究，并从经济角度对其进行分析的人士之一。今天，人们正在仔细研究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所有方面。这反映出教育对经济增长、国际竞争、文化以及政治与社会发展的作用正日益得到公认。在人们如此大量地叙述与谈论大学之前——在他们对大学之功用如此了解之前，任何人只能揣测大学是否是有实用价值的场所。

克拉克·克尔

加利福尼亚，伯克利

目录

1982 年前言	2
1963 年前言	5
一、多元化巨型大学观	1
二、联邦拨款大学的现状	33
三、智力城的未来	62
后记——1972	90
后记——1982	107

多元化巨型大学观

大学开始时是作为一个单一的群体——教师和学生的群体而出现的。在有了一个起中心作用的生机勃勃的源泉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它有了一颗灵魂。当今美国规模较大的大学更是拥有以共同的名称、共同的管理委员会以及由与之相关的目的维系在一起的一整套群体和机构。对这一巨大的变革，一些人为之惋惜，许多人已经接受，少数人至今感到自豪。但是它应当被大家所理解。

如果把它同过去的纽曼红衣主教 (Cardinal Newman) 的学院回廊和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 (Abraham Flexner) 的研究组织加以比较，对当今的大学也许会有所了解。那些机构乃是它得以产生的理想的类型，仍然是使学生产生幻想的理想机构的类型。然而，现代美国大学不是牛津大学，也不是柏林大学；它是世界上一种新型的机构。作为新型机构，实际上它并不是私人的，也不是公立的；它既不完全属于世界，也不能与世隔绝。它是无与伦比的。

“大学观”，也许从未有人象纽曼红衣主教在一个多世纪前创立都柏林大学时表述得那样清楚⁽¹⁾。他的看法反映了他当时毕业的牛津大学的思想。纽曼主教写道，大学乃是“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 and 发现、实验和思索的高级保护力量；它描绘出理智的疆域，并表明……在那里对任何一边既不侵犯也不

屈服。”他提倡“文理学科方面的知识”，并说道：“实用的知识”乃是不足称道的。

纽曼特别反对培根的幽灵。培根在大约 250 年前曾谴责过“一种对心灵的崇拜……由于这种崇拜，人们大大放弃了对自然的思考，放弃了对经验的考察，只在他们自己的理性和幻想中上下翻滚。”培根相信，知识应当有益于人类，并为人类所利用，“不应当象高级妓女那样只是为了寻欢作乐和满足虚荣心，或者象女奴那样为了供主人使唤；而是象配偶那样传宗接代，带来幸福与欢乐。”⁽²⁾

对培根的话，纽曼的回答是：“知识可以有它自己的目的。这就是人类智慧的积累，任何一种知识，只要它果真如此，就是对它自己的报答。”他同培根针锋相对，以犀利的笔触写道：“先生，你会说功利主义哲学至少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这我承认，它的目标不高，但是它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纽曼认为，其他一些机构的任务应当是研究，因为“假如大学的宗旨是科学上的发明和哲学上的发现，那么我不明白大学要学生做什么”，这种意见是当今大学生所作的讥讽性的回答，他们经常认为教授们的兴趣根本不在他们身上，而是在研究上。纽曼说，大学教育“其目的在于提高社会理智的格调，培养大众的心智，净化民族的情趣，给大众热情提供真正的原则，使大众热望达到固定的目的，扩充和节制时代的观念，促进政治权力的行使，以及改善私人生活的交往。”它培养一个人“能胜任任何职位，并容易掌握任何一门学科。”

这个美好的世界，甚至在它被描绘得十分美好的同时，正不断地遭到破坏。在 1852 年，当纽曼写作的时候，德国大学正在成为新的模式。民主的、工业的及科学的革命正在西方兴起。“任何社会中很自在”的绅士很快就不自在了。科学开始取代道德哲学的位置，科研开始取代教学的位置。